

爷爷的家国情怀

薛玉璇

我的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，还是一位光荣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有过多次战功的老兵，他今年已经101岁了，生活还能自理。爷爷和村里的乡亲一样，住着简陋的平房，过着朴素的农村生活。只有两枚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”和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”，无声地诉说着爷爷经历的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，见证着他一心跟党走的红色足迹。

当年，爷爷怀着一颗为穷人打天下的决心，毅然决定参军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那年他才刚刚十八岁。随后，爷爷随部队南征北战，在战火中锻炼成长。他先后参加过解放济南、徐州、蚌埠、上海等战役，转战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四川等战场。战斗中他机智勇敢，不怕牺牲，曾荣立一等功两次，二等功两次。1967年7月1日，爷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50年10月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爷爷所在部队奉命开赴朝鲜，刚到不久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。空中炮弹呼啸，头上飞机狂轰滥炸，身边子弹乱飞，爷爷冲锋陷阵，奋不顾身。有一天，爷爷所在工兵营奉命架设浮桥，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、扫射、扔炸弹，突然一颗炸弹在身边爆炸，爷爷失去了知觉……等醒来发现，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原来他

受伤后被紧急转送到了后方医院，所幸只是被弹片击伤了后脑皮肉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在沈阳后方医院养伤。等伤势好转，爷爷曾多次请命返回战场，没有得到批准。

爷爷复员回到家乡后，没有居功自傲。短暂休养后，立即赶到附近的氟石矿上班，又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。他牢记党的教导，继续发扬革命传统，保持着一个战士的冲锋陷阵姿态，脏活累活他抢着干，有危险的地方是他总是冲在最前面，爷爷连续多年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生活困难，多数工厂停工停产，爷爷只能回到家乡务农。他临危受命，担任村干部，带领乡亲们寻求一条走向富裕的道路。爷爷起早贪黑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。有许多人劝他再找组织，争取回到工厂，爷爷笑着说：“我亲眼看见许多战友壮烈牺牲，他们没有享过一天太平日子，我活下来就得替他们多奋斗，为家乡父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是一名党员，必须处处带一个好头儿。”朴素的话语，道出了爷爷的家国情怀。

如今，爷爷在乡下安度晚年，党和政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爷爷很感恩，嘱咐儿孙千万千万不要给国家给政府添麻烦，好好工作，多为社会做贡献。

那束永恒的光芒

周广玲

我成长于一个朴素的工人家庭，父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，母亲则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小学教师。孩提时代，父亲总爱在晚餐后，向我讲述他年轻时参与技术攻关的英勇事迹。“那时候啊，”他的眼眸闪烁着光芒，“我们党员总是冲锋在前。”尽管那时的我对“党员”一词尚感陌生，但从父亲的神情中，我能深切感受到一种崇高的敬意。母亲的书架上，整齐排列着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等泛黄的书籍，她常言：“这些书中蕴含着为人处世的真谛。”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，“共产党”这三个字，如同空气中的氧气，无形却滋养着我茁壮成长。

大学二年级时，我怀揣着满腔热忱，踏上了偏远山区的支教之旅。那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村落，教室是简陋的土坯房，孩子们身着打满补丁的衣裳，但他们的眼眸却闪烁着最耀眼的光芒。村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李大爷，他每天清晨都会拄着拐杖，蹒跚两里山路来到学校，义务为孩子们修理桌椅。当我问及他为何如此坚持时，他满是皱纹的脸庞绽放出温暖的笑容：“我入党时曾宣誓，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”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眼中的光芒在李大爷身上重现。李大爷佝偻的身影在夕阳下被拉长，那份坚守与奉献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具震撼力。

返校后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中。在浩瀚的书海中，我研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《毛泽东选集》《邓小平文选》等经典著作，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深深触动了。马克思的“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”、毛泽东的“为人民服务”、邓小平的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，不再只是冰冷的铅字，而是成为我心中可触可感的思想脉络。我积极参与学校的党课培训，在讨论会上，不同专业同学的多元见解碰撞出智慧的火花，令我沉醉其中。我渐渐明白，入党并非追求个人的荣耀与光环，而是一种责任与担当的选择。

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天，我反复推敲、修改了十余次。并非词句不够优美，而是担心自己的诚意未能充分表达。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时，我深情讲述了李大爷的故事、我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以及我的困惑与思考。我坚定地说：“我渴望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，哪怕只能照亮一方小小的天地。”书记沉默片刻后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。”

转正大会上，我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。那一刻，二十余年的人生片段如电影般在脑海中闪回：父亲讲述故事的夜晚、李大爷佝偻的身影、图书馆里泛黄的书页……这些画面最终汇聚成一面熠熠生辉的党旗。我的眼眶湿润了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并非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



欢舞感党恩 李海波 摄

信仰的温度

王治刚

1970年，十六岁的父亲不再继续学业，回到生产队务农。他当过兽医，学过裁缝，但都干得不长久，最终还是回到土地上刨食。

父亲二十八岁那年，老生产队长年近六十，不愿继续再干。退下前，他力荐父亲接班，经大队支部同意，开社员大会投票，父亲全票当选。父亲成了全大队最年轻的生产队长。

父亲上任后，带着大家忙农事、修沟渠，还教大家修沼气池，安沼气灯。如果出现邻里纠纷，他还会第一时间出面调停。大伙儿打心眼里服他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。

三年后，父亲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庄重的时刻，父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宣誓那天，父亲右手高高举起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宣誓完毕，他小心翼翼地把党员证揣进贴胸口袋。回到家后，又锁进了收藏柜里。我曾看到他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：“作为一名党员，要有信仰，这信仰就是始终为人民服务。”

第二年，到了育秧时节，天气仍旧寒冷。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推行几年，仍需生产队统一搭暖棚，才能保证秧苗顺利播种下去。在父亲牵头下，大家齐心协力搭好了暖棚。那天，天还没亮透，父亲就摸黑钻进暖棚察看秧苗长势。没曾想，意外发生了，父亲一脚踩滑，踩进了滚烫的水锅，他双手死死抓住烫得发红的竹架，咬着牙把腿抽出来，可小腿已经烫得通红。队里的人随着母亲赶来，七手八脚把他抬回家。路上疼得直冒冷汗的父亲，还不忘叮嘱：“暖棚里的事儿，可得找个靠得住的人盯着！”母亲说：“还有我在呢！”

头三天，父亲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整宿整宿睡不着。可一到晚上，他就拉着母亲问：“今儿秧苗长得怎么样？分秧的人手够不够？”等到分秧那天，他拄着枣木拐杖，一瘸一拐地挪到暖棚边。看着乡亲们挑着嫩绿的秧苗往田里走，父亲笑了，笑容比五月满树的洋槐花还要灿烂。

后来，在市场经济带动下，村里外出谋生的人逐渐多起来。为了给我凑齐上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，父亲和母亲也在城里开了间小餐馆，可只要队里修水渠、架电线，父亲二话不说，撂下店里的生意就往老家跑，母亲从不抱怨。隔壁赵婶直摇头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在城里踏实挣钱不好吗？瞎折腾！”父亲却把党徽别得端端正正：“我戴着这枚党徽，就要对得起这份责任！”修盘山公路那会儿，母亲在饭馆里刚算完当天的收支，又跟父亲算了一下修路成本：即便由政府主办，村民也得投入大量人力。有人嫌活儿重想打退堂鼓，父亲抄起铁锤就往山上冲，扯开嗓子喊：“跟我上，党员要是孬种，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！”

村里的党员大会，父亲从不缺席。天不亮就赶头班车回村，散会后再急匆匆往城里赶。回到家，他总爱翻那本边角都磨卷了的笔记本，招呼我过去：“小子，来听听国家大事，国家要搞西部大开发了。”说这话时，父亲眼里闪着光，语气里全是藏不住的兴奋。

父亲走时，才五十六岁，他的党龄二十五年。我从他贴身口袋里摸出那本党员证。封皮被岁月磨得发亮，内页密密麻麻记满了事儿：“张寡妇家孩子学费。”“李大爷家修房借了五十块。”……

如今，我的党龄也正好二十五年，我不禁想到了父亲，想到他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担当和付出。是父亲，让我更加坚信，所谓信仰，其实就是把乡亲们的难处当成自家的事儿，用一辈子的热忱，温暖每一颗心。这，就是父亲用一生教会我的——信仰的温度。

